



尚可喜归降后金原因分析

——兼评尚可喜生平

刘玉文

(承德避暑山庄研究所,河北承德 067000)

摘要:在尚可喜的人生旅途中,叛明归后金一直是一个学界争论的话题,无论是赞成,或是反对,都必然探讨其叛明归后金的原因。本文在综合众多史料的基础上,从明与后金双方政治、军事等方面分析了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分析尚可喜叛明归后金的原因,并指出尚可喜一生中的重大建树。

关键词: 尚可喜;后金;三藩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70X(2016)06-0123-05

PDF 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6.027

A Study of Surrender Reason of Shang Kexi to Post-Jin Government and Shang's Life

LIU Yu-wen

(Mountain Resort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ngde, Chengde 067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Shang's life, it is always a hot topic of Shang's surrender to Post-Jin. Whether we are agree or not, it is necessary to talk about the real reason of this action. The paper collected many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compared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dvantage between Ming and Post-Jin Governments. The paper also reveal the real reasons of Shang's rebellion and his life achievement.

Key words: Shang Kexi; Post-Jin; San Fan

尚可喜(1604—1676)字元吉,号震阳,辽东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市)人,隶汉军镶蓝旗。父尚学礼,为明军东江游击,楼子山战役中殉国。尚可喜少年随军,崇祯元年(1628)隶总兵黄龙麾下,以部校职驻皮岛。崇祯四年(1631)皮岛兵乱,黄龙不能弹压,可喜率兵斩为首者,事定众服。崇祯五年(1632)可喜以皮岛平乱和御孔有德、耿仲明犯旅顺有功晋升副将,驻广鹿岛。天聪八年(1634)归降后金,初授总兵官,号其军“天助兵”。崇德元年(1636)封“智顺王”,顺治元年(1644)从征入关,顺治六年(1649)改封“平南王”,七年(1650)克广州后,留镇广东。康熙十四年(1675)圣祖特谕晋“平南亲王”。

尚可喜素矢忠贞,智勇过人,爱兵友将,晚年清圣祖称其“累世勋旧,奇猷众望,久镇岩疆,劳绩懋著”^[1],其叛明原因历史记述不一,最少可见五说:

一、崇祯六年秋,后金兵复犯旅顺,总兵官黄龙战败自杀,朝廷以阉党派系沈世魁代黄龙任总兵,原将校不服,沈世魁迁怒尚可喜,以部校王庭瑞、袁安邦等诬陷欲置罪,激变尚可喜^[1]。为遭诬陷而逃罚说。

二、崇祯继位,“(魏)忠贤伏诛,复起用(袁)崇焕督师蓟辽,崇焕以皮岛大将毛文龙骄蹇不用命,设计诛之,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叛明降清”^{[2]17}。为杀主帅恐遭株连而叛变说。

三、尚可喜“辽东人，为毛文龙养孙，勇而善谋，时官游击，文龙死，率亲兵五百归满洲”^{[3]卷49,页18}。为荫依主帅不成而叛明说。

四、自天聪五年(1631)起，辽东明军名将祖大寿、孔有德、耿仲明相继归降后金，尚可喜遂于“(天聪)七年十月二十四日(1633年11月25日)约降于后金，再于(天聪)八年三月初六日(1634年4月3日)率三岛(广鹿岛、长山岛、石城岛)军民归降后金”^{[4]79}。为见贤思齐归降说。

五、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遣官营造孔有德、耿仲明第宅，二人固辞，不允。尚可喜招抚长山、石城二岛，携人民数千户来归”^{[5]35}。为礼遇归降汉官政策感召投诚说。

以上诸说，除在时间与细节上略有不同，其归降原因却各执侧重。笔者以为，尚可喜幡然决断叛明降后金，决非历史一因一事所能解释者，应与辽东战局，与明朝的腐败，与后金推行优礼降官政策有着深刻联系，兹不揣浅薄以作探析。

一、明朝政治腐败，军心动荡是尚可喜归降后金的根本原因

有明一代官员结党和太监专权是历史上著名两大政弊，直接影响到朝野视听，致使“党附者扬眉一时，正直者自危身家”^{[6]卷六十七,万历二十年二月辛酉}。万历中期以后，各级官吏贪渎渐趋严重，党派之争日益激烈，竟令钦命考核官者“褒抑、奖惩无措手足”^{[7]24}。

熊廷弼是明代著名军中统帅，史称其能挽弓“左右射”，知兵善战。万历三十六年(1608)巡按辽东，“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6]卷七十六,万历三十七年六月癸酉}，数年间绩效斐然，辽边治理日臻。但是，因其不朋比将吏，不阿附权贵，竟成为党争中的牺牲者，被免官回籍。辽东战事改任不谙军事的袁应泰为经略。结果诸事纷乱，不理军务，为后金进兵辽阳、沈阳，从而占据辽河流域，提供了有利时机。这一历史变故对尚可喜是耳熟能详的史事。

浙江巡抚朱纨在奉旨剿灭海盗时，曾讲过一句话：“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8]卷96,朱纨传}最后朱纨无奈自杀，所言“衣冠之盗”即指在朝的贪官、内监，朝政的腐败竟危及地方封疆大吏的安全。

天启以后，官吏党争和宦官专擅进一步发展到军队内部。围绕辽东防务，皇帝竟无可信将帅为用，以致朝令夕改，或派出太监作“监军”，凌驾于将帅之上，极大地损伤了明军的战斗力。例如派司礼监太监刘应坤“总理”山海关防务，派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作“协守”，派御马监太监孙茂林、武俊、王莅朝“分

守中军”^{[9]49-54}。越到明末，军中的“监军”、“总理”越多，且皇帝屡赐“尚方宝剑”到军中，有时成为诛除异己的法宝。对此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其中包括素怀忠心的尚可喜。

对于辽东防御，东林党人反对由太监派系人物出任辽东统帅，其中包括不是东林党人却持有相同政见者，诸如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他们认为太监不懂军事，只能“误国害民”，寄希望于正派官吏在辽东力挽狂澜。然而皇帝不辨忠奸，一旦遭到攻讦便改换经略，致辽东少敢问津者。孙承宗在辽东主张“定军制，建营舍，练火器，治军储，缮甲仗，筑炮台，买军马，采木料，救难民，练骑卒”，“坚守关外，保卫关内”，反对“重关设险，卫山海(关)以卫京师”^{[8]卷259,袁崇焕传}。孙承宗整饬辽东军务的方略刚刚开始，其属下大将马世龙兵败柳河，方略便被全盘否定，遭撤职，改派阉党派系尚书高第为辽东经略。至此长城以外尽撤兵，只留宁远孤城防守。

朱由检继位之初，颇器重毛文龙、袁崇焕。然而袁氏为东林党人所推崇，毛文龙却为阉党派系王化贞所支持。袁崇焕督师辽东赴任前，大学士钱龙锡密嘱“朝议皮岛毛文龙难取”，“自征赋额，聚敛财货”^[10]，“可用用之，不可用杀之”^{[11]7}。适逢袁崇焕欲以缓兵计整饬辽东，皇太极因攻伐朝鲜亦有辽东用兵暂缓之意，于是双方开始了均无诚意的议和谈判，而毛文龙力斥议和。袁崇焕遂中皇太极“杀文龙，可让出辽东”之计，借袁督师之手诛杀毛文龙^{[12]5}，由此激起崇祯帝对袁崇焕的疑忌。对此，史家评说，“袁氏身膺不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13]。3个月后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一线明军劲旅，从“城垣颓落”“军武废弛”的喜峰口突入京畿，吸引袁崇焕率军入京勤王，造成袁军招引后金兵进攻北京的假象。于是再使崇祯皇帝中反奸计，以“资敌通敌”¹⁴罪诛杀袁崇焕。明军内部猜疑，彼此倾轧，导致军心动荡，大批兵士因主帅被杀而惊惧逃离，将弁或降后金以自保。

政治腐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便是军中贪冒严重，兵士恶而生叛。天启、崇祯时期，尽管筹措辽东军需，“辽饷”的征缴已惹天怒人怨，但是辽东仍是兵缺粮饷，马无草料，其中大部分辽饷已中饱私囊。如辽东重镇开原防务，兵备推事官郑之范，对各处军营的军饷、粮秣一概拖欠不发，“草、豆并无升束，马食菊秆，一日倒毙二百四十九匹”。“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取钱粮，一月不给”，兵士饥饿，“各军衣物尽变(卖)，马倒人逃”。各营军马无草料，只得野夕馊养，“离城草茂之处，趁青喂养马匹，贼(指后金兵，笔者注)至猝不及收”^{[7]16}，竟被掳走。而郑之范不过是七品低职军官，因贪污冒领，

却“家私巨万,天日为昏”^{[7]15}。

明末政治腐败首先是吏治腐败,造成用人失当,将帅不和,派系倾轧;次之是贪贿成风。于是兵心涣散而无战斗力,带来辽东战事节节败退,极大地动摇了有识者的忠节观念和为之冒死效力的信仰,尚可喜亦无例外。

二、后金蓬勃发展的政治趋势和节节胜利的军事态势,对辽东地方势力是巨大的吸引力

后金政权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大汗出色的文治武伐,在统一女真、内蒙古诸部“倾心归顺”和征服朝鲜之后,便集中力量面对明朝。萨尔浒战役后,明朝已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其结果仍是丢城丧师,节节败退。先是努尔哈赤佯称互市,“潜以精兵踵后,突执游击李永芳”^{[7]1},计破抚顺城,虏人畜30万。再以“冒板挖墙”之策,攻取清河,守将邹储贤、张旆战死^{[14]卷572,万历四十六年七月戊申}。继之,以疑兵、奇兵、收买明将丁碧和化装间谍等战术,智取开原、铁岭等重镇^{[14]卷584,万历四十七年七月辛丑}。于是广袤的辽东大地,仅余孤悬的旅顺和锦州、宁远、松山、山海关一线防守。尚可喜等地方势力,耳濡目染后金的政治发展和在战场上取得的节节胜利,震动巨大,感触至深。

尚可喜归降后金前夕,形势咄咄逼人,正是皇太极六次纵兵伐明的前三次。

一次是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亲率大军攻宁远,攻不下,回攻锦州,不克,毁大、小凌河二城,尽掠人畜而还。

二次是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从喜峰口突入龙井关,连取潘家口、马兰峪、洪山口、汉儿庄各边城。围攻遵化,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急援,被后金大将阿济格拦截斩杀,遵化城陷,明巡抚王元雅自杀。后金兵作出直取京师之势,在蓟州城与急援北京的袁崇焕相遇,后金兵避而不战,向西接连攻占玉田、三河、香河,十一月十五日驻营通州,震撼北京。在攻占遵化之后,复攻占永平、迁安、滦州,击杀大将满桂(明朝蒙古族战将),俘获总兵官黑云龙、麻登云,严重地消耗了明辽东及京师防御的有生力量。此战并非真取北京,诚如史载皇太极话:“城中痴儿(指崇祯皇帝,笔者注)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15]

三次是天聪五年(1631)秋,皇太极以“围点打援”的战略战术,围困明军整修坚固的大凌河城,进一步消耗明在辽东的兵力。史称城中“兵将、夫

役、商民三万余人”,被明兵部尚书兼辽东经略孙承宗和巡抚丘禾嘉视为“坚垒”^[16]。后金兵八月初六日夜围城,围而不攻,后金兵循城墙掘三道壕堑,筑一道高墙。壕堑一道深、宽各丈许;二道宽五尺,深七尺五寸,铺秫秸、敷土;三道为深宽各五尺的“拦马壕”;壕侧筑墙丈余高^{[17]天聪五年八月,〔18〕}。后金围困大凌河城,部署主围兵,以八旗各旗固山额真统领,四正四隅驻营,每队后设有机动策应骑兵,另有蒙古骑兵充当间隙游动作战^{[17]天聪五年八月}。此次战役中后金开始使用“红夷大炮”和大将军炮,各旗均建制“炮兵营”,每营配备大炮数门^{[17]天聪五年八月}。

在后金兵严密围困大凌河城的过程中,明兵曾三次出城,皆大败撤回,守城主帅祖大寿唯有等待锦州、松山援兵到来。第一次救援,出兵6000,由辽东巡抚丘禾嘉、总兵吴襄、宋伟亲统,在长山与小凌河间大战,兵败退回锦州。第二次救援明朝尽出最大能力,派监军张春,会同总兵吴襄、宋伟,战将百余名,马步兵4万,战于大凌河城下。双方炮战对垒,但明兵经不起后金骑兵的冲击,惶惶撤退时又中埋伏,结果,包括主帅监军张春和副将张洪谟、杨华征等33员大将被俘,副将张吉甫、王元敬战死,吴襄、宋伟落荒逃回锦州。至此明军再不敢救援。

大凌河城被围困3个月,城内粮尽薪绝,兵食战马而不足,人相食不及而死,惟祖大寿存米1.2升^[19]。守城主帅不得不杀掉反对派副将何可刚举城投降。

面对上述战绩,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后金锐气十足,而明辽东守军退缩一线,甚至京师旦夕难保。这一严重的政治局面使辽东地方势力不能不对未来归宿作出抉择。尚可喜家族人口众多,是辽东殷实之家。在举目动荡的岁月中,为托保身家,巩固已有的政治地位和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无疑后金政权是最可信赖的依靠,何况这时孔有德、耿仲明展示了可供选择的出路。

三、皇太极执政以来“优礼汉官”政策及其影响是尚可喜归降后金的主要原因

“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意识是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能为礼遇自己的君上忠贞不贰是那个时代的道德准则。这是后金政权推行“恩养”政策的思想前提。

努尔哈赤时期,对汉官曾提出“恩养”,由于努尔哈赤推崇历史上的辽金帝国,热衷于建立民族统治国家,受此局限,恩养更注重对归顺后金的武职将弁,如天命三年(1618)对待抚顺降将李永芳,归降后

从原游击晋为总兵,并将孙女下嫁与他。相反,颇具才学智谋的范文程,因系文职,仅授予“章京”,不过文职小吏。

皇太极深谋远虑,高屋建瓴,继太祖的恩养措施发展而为“优礼汉官”政策,包括后来开科取士和重用汉人有才能者。政策的实质是笼络、收买、重用来自明朝的文武官员,赢得他们对后金政权的承认、支持与合作,以建立满汉联合封建集权统治,“作天下主”,即全中国的大皇帝,而不仅仅是满洲皇帝。从《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天聪元年至崇德元年间,皇太极的七道“上谕”中可知对汉官的“礼遇”政策大致有下列九项:

一是不论主动举事来归者,还是因不满明朝来降者,或战场俘获者,或被逼无路投顺者,均一体看待,给予礼遇。

二是归降受封赐者,其子孙可承袭遗产、父爵。

三是汉民百姓起义,杀掉官吏来归者,量其功劳、携丁多寡,酌授官职。

四是武职率兵归降者,量领兵人数论功授职。

五是单身一人归降者,或得恩养,有官职者委职晋升。

六是归降后的逃离者不予追究,来去自便。

七是凡归降者必先宴迎,复赐予财物、奴仆。

八是将吏来降者优礼尤隆,先由各旗主分别宴迎,后大汗(皇帝)宴请。

九是凡归降汉官皆受器重,不限文职、武职。

皇太极推行礼遇汉官政策,是其远大政治抱负决定的,政治目的明确。天聪元年他对各旗旗主表示:“朕对早归与新降汉官,不惜衣物、财帛、马匹、牲畜加以恩养,又每天三次赐宴,岂能不知麻烦?朕即要使人心悦服,以图取大事。”^{[3]卷二十二,页22}“图取大事”即是要取代明朝以成帝业,在他看来,“贤能之人”最为重要,得到贤能者的支持与合作尤为重要,令其能“远明而亲我满洲”^{[3]卷二十三,页198}。因此宣称:“惟多得人为可喜耳,金银币帛用之有尽,如收到一二贤能之人,堪为国家之助,其利赖宁有穷也?”^{[20]373}

皇太极的“优礼汉官”政策,不仅广泛宣传,而且注重具体落实。仅举几例以说明:

例一,皇太极对范文程,虽仍为章京,却事无巨细皆向他请教,纳入枢垣,引为知己之臣。经常“赐殊方珍味”之宴,并赐范父,令人送到家。

例二,天聪四年(1630)后金兵攻占永平,明户部郎中陈此心归降,事后叛逃,被捉论死罪。皇太极赦免说:“业已恩养,何必杀之?彼既非愿留此,何不放回原籍。”于是赐马2匹、驴4匹、银20两,令其携家

眷、仆人离开^{[3]卷六,页24}。

例三,天聪五年(1631),第一次攻取大凌河城,投降汉官150余员。皇太极表示:“来归者甚众,我国虽财用未充,必尽力恩养尔等。”对他们汉官视其职位分别赏给仆役,共1524名、牛314头,另赐庄屯土地。赏毕,八旗旗主轮番宴请,每天三小宴,五天一大宴^{[3]卷十,页17-27}。

例四,大凌河守城主将祖大寿天聪五年(1631)降后金,祖氏假称赴锦州劝降却乘机返明。崇德七年(1641)松山战役中兵败再次投降,皇太极对此反复之人不计前嫌,委以重任。

例五,有些归降汉官待遇数年间已超过满族官员,皇太极对此十分高兴。崇德元年曾对汉官谕称:“朕拯救诸臣于涂炭,爰养有加,今尔等已富贵矣。”^{[3]卷三十七,页14}此言不虚,归降汉官封王及大臣者,占有家丁八九百,几达千名,最少者不下百丁;下等官吏亦有二十余丁。有些武职汉官往往隐私丁不报,皇太极尽予宽容。

皇太极礼遇归降汉官政策,影响深远,吸引力巨大,是后金政权与明争定天下,夺取全国胜利的组织保证。这一政策的推行,形成清初延揽汉官,壮大人才队伍,为国效力的通途,与明朝党派倾轧,擅杀疑忌者,构成鲜明对照。尚可喜便是这一政策的有识者和先行者之一。

四、结论

鉴于明朝政治腐败,党争不已,军事收缩局面和后金政通人和,广纳贤良,军事进攻的发展态势,尚可喜于崇祯七年(1634)归降后金,为大清政权统一中原,更新政治,作出重大建树,屡获晋封,成为有清一代屈指可数的藩王之一。终其一生,难能者有四:

其一,不与腐败为伍,持正向贤,归降后金应属“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历史哲学的实践,可谓归降有据。

其二,面对华夏一统,盛届承平,贵为藩姓新王,尚能审时度势,申明大义,适时疏请撤藩归老,可谓俊杰识务。

其三,吴三桂拥兵自谋,重起战端,危及国家统一,乃国之大害。尚可喜泾渭分明,疏请平叛,“笃诚为国,计虑周详”^[1],提出“长江宜设舟师”^{[4]98};及时通报军情,奏报“吴三桂于衡、湘造船千余,欲分发岳州、荆州,并进取江西,将来春水泛涨,长江上下宜预为设备”^{[4]102}。可谓“怀诚事主,至老弥笃”^[1]。

其四,自不恋位,择贤禅让,选次子尚之孝袭爵,并以古稀之身,抱病平叛,终老任上,可谓公忠体国,一生不失全节。

(下转第139页)

动,引导青年行政干部在学习实践中磨练成长。机关党支部可以根据职能部门的业务类别,采取党支部立项活动、支部主题党日等方式,推行“党员政治生日”制度、首问首办责任制,开展“党员先锋岗”、“学理论、学业务、学先进”、“比服务、比效率、比奉献”三学三比活动,组织机关青年党员干部有针对性的参加实践锻炼,建设爱岗敬业、乐业精业干部队伍。二是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建立健全培训进修长效机制。制定基层青年行政管理干部轮训计划,采取业务练兵、理论研讨、进修学习、技能展示等多种形式,对青年干部压担子、练胆子。定期送优秀青年行政干部到外校进修深造,吸收新的管理理念,开拓眼界增长见识,提升工作层次水平。

选树先进典型,引导创先争优,营造团结合作健康进取的团队氛围。机关党组织要注意在机关青年党员干部中选树典型,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身边人身边事激励青年一代。同时,认真做好在机关青年行政干部中发展党员工作,积极吸收青年干部群体中的优秀分子,给予党的培养教育和党性锻炼,培育为师生服务的行政意识和思想素质,帮助其更好地成长成熟。

(三)践行群众路线,贯彻三严三实,帮扶青年行政管理干部解决实际困难

畅通组织沟通渠道,落实党员联系群众制度。机关党组织要深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按照“三严三实”工作要求,认真落实党员联系群众制度,使党建工作扎根基层,入脑入心。指导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干部,深入机关一线,落实党员干部定期联系青年干部制度,由机关处室领导对口联系本单位青年干部,落实谈心制度,了解他们的所想所需,有针对性的开展帮扶工作。同时,跟踪了解青年干部成长情况,及时将本部门青年培养情况反馈给党组织,为学校修订完善机关青年干部人才培养规

划提出意见建议。

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在关爱中增强教育效果。机关党组织要紧密联系校工会、团委等工青妇组织,开展工会建家、青年联谊会、教职工趣味运动会等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的群团活动,关心机关青年干部住房、收入、子女入托入学等实际问题,给予人文关怀,帮助他们正确应对工作压力,舒缓职业倦怠感,增强组织归属感和凝聚力。

完善激励保障机制,优化机关青年人才发展环境。高职院校机关党建要以推动管理人员提升专业化水平,提高管理效能为目标,在学校机关行政激励考核制度和机关青年行政管理干部培养规划建设中充分发挥思想引导、组织保障作用。要打破大锅饭式的机关考核模式,针对高职院校机关管理干部成长规律和特点,建立有别于专任教师的机关干部人才培养机制,着力从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理论素质、业务素质四个维度,综合考核机关青年行政管理干部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组织沟通能力,提升他们的服务意识、参谋意识、效率意识和责任意识”^[5]。

[参考文献]

- [1] 吴莹辉. 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经济师, 2012(6): 99+101-101.
- [2] 李芮, 黄建军. 影响高校基层党组织对青年教师凝聚力的因素探析[J]. 萍乡学院学报, 2015(2): 16-19.
- [3] 伍处文. 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3(12): 1-1.
- [4] 徐桂庭. 《行动计划》让“悬浮”的政策落地生根——专家解读《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5(28): 19-25.
- [5] 万红慧, 左征军, 田贵华. 试论高校机关工作人员的全面发展[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8(1): 61-63.

[责任编辑 朱毅然]

(上接第 126 页)

[参考文献]

- [1] 清史稿(卷 20)[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2] 印鸾章. 清鉴纲目[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 [3] 清太宗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4] 戴逸, 李文海主编. 清通鉴(第 2 册)[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9.
- [5] 蒋良骥. 东华录[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 [6] 夏燮. 明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7] 王在晋. 三朝辽事实录(卷 1)[M]. 北京: 全国图书馆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 2002.
- [8]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9] 明熹宗实录(卷 19)[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 [10]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 4), 毛帅东江.

- [11] 袁督师遗稿遗事汇编[M]. 拜袁堂, 1941.
- [12] 明毅宗实录(卷 2)[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 [13] 谈迁. 国榷(卷 90)[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14] 明神宗实录[M].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 [15] 昭槠. 嘯亭杂录(卷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6] 明兵部呈为王道直报大凌河城之役明军损失情形本[J]. 历史档案, 1981(1).
- [17] 王先谦. 东华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18] 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史料片断[J]. 历史档案, 1981(1).
- [19] 金梁. 满洲秘档(大凌河杀人而食)[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6.
-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满文老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责任编辑 李兆平]